

明清拟话本小说文人作者的“夹处”心态及其影响

吴飞鹏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摘要: 自明末至清中叶, 文人拟话本盛行一时, 作者辈出。以群体的视角考察这些文人小说家, 可以发现他们在身份认同、价值认同、日常生活体验等层面都面临着“夹处”的心态困境。这一困境又导致其自我认知的游移和不断进行的自我解释, 从而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否定、主观与夸张的写作风格, 背后则反映了文人小说家精神世界实际所处的焦虑。对其的相关辨析, 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理解文人作者对推动明清拟话本小说演变的意义。

关键词: 明清拟话本小说; 群体视角; 文人小说家; “夹处”心态; 写作风格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3)04-0176-12

一、引言

明中后期以来, 文人逐步成为通俗小说的编创主体, 这一点已成学界共识^①。其中, 自明末至清中叶(约17—18世纪), 文人拟话本盛行一时, 作者辈出, 由此形成了一个特定文体下的创作群体。相较于此前的民间说书艺人、书会才人以及书坊主, 这群文人小说家因身份意识、价值立场、生活体验的差异, 生成特殊的心态, 进而形塑了其所编创小说的外在面貌和内在品格。因此, 把握这些文人小说家的精神特性, 对于理解拟话本小说在明清时期的演变颇为关键。

然而, 由于史料的缺失, 明清拟话本小说文人作者中的大部分, 真实姓名不明, 生平难详。因此, 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资料留存较多的文人, 如冯梦龙、凌濛初、李渔等。新近的一些代表性成果, 仍保持这种趋势。如冯保善《冯梦龙史实三考》新见冯勛履历, 考知“冯梦龙父亲叫冯曙, 廪生”;“冯梦龙兄弟不是三人, 而是四人: 梦桂, 梦龙, 梦熊, 梦麟。

梦麟为儒医”。另又推知“《古今谭概》当纂成于冯梦龙42岁至47岁之间”;“《情史》之成书, 应当在天启三年宋存标《情种》辑刊之后至《古今小说》编辑成书之前, 约在天启三、四年之间”等重要史实^[1]。徐文斌《凌濛初的南京冶游历程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则致力于还原凌濛初“早年曾因落魄到南京游历, 出入青楼以求藉慰, 为此结识青楼女子河阳姬”及二人之间分合的波折等情形, 并将其与凌濛初“主张文学创作要有真情实感的‘自然观’”“对侠肝义胆、快意恩仇的‘侠女’和一些敢于突破传统伦理束缚, 追求爱情自由和婚姻幸福的女子持有褒扬态度”等文学创作观念、风格联系起来^[2]。这些当然都是相关作家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不过, 在新出资料有限的情况下, 当前的思路恐将影响我们对这批文人小说家的全局性把握。

有鉴于此, 本文从两个方面转换思路: 一是将个体研究转换为群体观照。对此, “知识精英参与大众文化生产”这一基本共性为我们将这些文人小说家视为一个精神共同体提供了内在的学理逻辑^②, 而文人拟话本小说的“千篇一律”

收稿日期: 2023-02-27; 修回日期: 2023-06-05

基金项目: 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董说诗文集笺注”(2221)

作者简介: 吴飞鹏, 男, 福建平潭人, 文学博士,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小说, 联系邮箱: fj-wufp@qq.com

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该群体所存在的精神共性的外化。这为“群体观照”的可行性提供了内外双重依据。二是从外部史料的钩沉转换为文本内部的开掘。如文人小说家继承并改造书场说书中的入话环节作为自身畅怀论议的载体，相关文字即成为考察他们精神动态的文学性“史料”；小说中加重的诗赋韵文等文人抒情成分，同样可供辨析其间潜存的精神因素。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文人拟话本小说集中面世的一百多年时间内，不仅经历了明清易代的短期冲击，还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在长期累积下的历时变动，而这些都势必对当时的知识群体的精神世界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③。不过，这一时段亦呈现出相对稳定的一面。具体地说，在这一百多年间，与本文所考察的小说家群体相关的传统社会结构、文化体制、精神观念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士、庶分野和四民社会的基本形态的维持，科举人口和识字人口的双重增长(分别意味着科举道路的愈加困难与大众读物消费市场的扩大)对部分文人转向通俗小说编创的刺激，读书人的文化精英意识与大众教化冲动的并存等。相比于晚清以后面临的西学冲击和社会变革、民智开化，“精英一大众”这一宏观尺度上的二元对立分析范畴，在这一时段仍具有较为普遍且典型的适用性。

基于上述群体观照视角、文本内部“史料”、长时段中的相对稳定性等因素的考量，本文聚焦“明清拟话本小说文人作者”这一小说家群体，广泛采撷并糅合不同作者来源的小说文献，企求对这一小说家群体的心态作一总体性揭示。本文认为，这一小说家群体，在身份认同、价值认同、日常体验、作品语言风格等方面，普遍呈现出一种“夹处”的心态。

二、身份认同：在“士”与“民”之间

作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士”，内部存在不同的层级，如官僚士大夫、著述之士、文章之士等。这些不同层级的士人之间，又各自存在程度和性质不一的身份隔阂。对于明清的拟话

本文人小说家而言，他们在传统诗文之外，致力于“更加贴近下层社会、下层民众”的“体裁、题材和表达方式”，则必然面临新形势下的“身份的焦虑”^[3]。

(一)“天下”视野与身份移位

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可以见出，当时的文人小说家从事通俗小说编创时，所面临的舆论环境仍然是正统士圈子对这一大众文体的拒斥，如所谓“恨乏唐人风致”^{[4](2)}。而其自我辩护、反击对方的焦点则在于“视野”。“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4](3)}，便是强调在新的视野下重新评估通俗小说的文艺价值。这种视野观要求跳出士阶层的小圈子，开眼看天下，在完整的四民社会结构中审视文学乃至政治意味的“文治”的意义^④。

这一经过革新的视野观，成为文人小说家群体及其圈子的共识。如翠娱阁主人评点《型世言》第四回时，特别指出李密《陈情表》虽文辞“低徊”，“然而里耳弗偕”^{[5](33-34)}。睡乡祭酒《连城璧·序》同样希望“天下之人”都能读到李渔的小说，“而吾友维持世道之心，亦沛然遍于天下”^{[6](247)}。谷口生“能大而不能小，有庙堂铮鏘之声，无茅茨纤细之韵，则又文人之罪也”^{[7](1)}的表述，则体现了这些文人从旧圈子到新视野的转变中试图重新定位自己的使命。

不过，新视野的建立引起文人小说家对“里耳”“闾阎”“市井乡野”^⑤前所未有的关注的同时，亦造成了自身身份认同的危机。无碍居士在介绍参与编刻《警世通言》的陇西君时，称其为“海内畸士”^{[8](2)}。天空啸鹤亦指《豆棚闲话》作者艾衲居士为“当今之韵人，在古曰狂士”^{[9](1)}。上述指称都与文人参与通俗小说的活动直接相关。王挺《挽冯犹龙》诗同样有“学道毋太拘，自古称狂士”之谓，亦是明确指向冯梦龙“修词逼元人”“纪事穷纤委”的通俗文学活动^[10]。可见这些文人小说家虽然在身份认同上仍未超出“士”的基本范围，但已无法再安心自处于其内部，而表露出有意对立、疏离的倾向。而如果将这种倾向与他们念兹在兹的“天下”视野互相参照，则他们势必会在“士—民”社会结构中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身份和责任。

然而,这种身份认同的主观位移将带来多方面的压力。第一,从历史的层面看,当中国社会发展到晚明阶段时,有通俗倾向的士人在绝对数量上是否真正地逊于正统士人其实尚未可知^⑥,重要的是话语权的争夺,包括攀附经史和雅文学的各类言说,以及对通俗文学法统的构建^⑦。而这些行动都意味着挑战一个悠久而强大的鄙弃俗文学的传统,因此面临无时不在的精神压迫。第二,从现实的层面看,这些文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正统士人的挑战,又使上述精神压迫变得更加直接、具体。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1594—1658)在《北游录·纪邮》中记载了与当代文人小说家的一次相遇:

观西河堰书肆,值杭人周清源,云虞德园先生门人也,尝撰西湖小说。噫,施耐庵岂足法哉!^[11]

可见二人当时发生了一次谈话,而周清源在谈到自己时,应是将“撰西湖小说”作为与“虞德园先生门人”并列的一大得意之处托出,而谈迁“施耐庵岂足法”的鄙薄之意恐怕难掩于中,则周氏当时的心情不难推知。

上述这类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对峙困境当不止发生于陌生士人之间。在明清拟话本小说的诸多序文中,常设计有一种主客问答的场景,对话则在文人小说家与其身边的亲友之间展开。如梦觉道人《三刻拍案惊奇·序》:

客有过而责余曰:“方今四海多故,非苦旱潦,即罹于戈,何不画一策以苏沟壑,建一功以全覆军,而徒哓哓于稗官野史,作不急之务耶?”予不觉叹曰:“子非特不知余,并不知天下事者也!……孰谓无补于世哉?”^[12]

对于这样的问答场景,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文人小说家日常生活经验的直接反映。从上述引文来看,争辩双方的语气都相当激烈,而这种紧张的程度恰恰折射出正统立场在日常生活中给文人小说家带来了足够分量的焦虑。二是将其理解作为一种情境构拟,是文人小说家表达创作意图所采取的修辞策略。不过,即使作如是解,仍然反映出小说家日常创作中的心理斗争。总之,二者都指向了文人小说家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身份认同的主观位移带来的压力。类似的

问答体,另如《警世通言·叙》:“而或者曰:‘村醪市脯,不入宾筵,乌用是齐东娓娓者为?’”^{[8](1-2)}

《连城璧·序》:“予谓:‘古人著书,如班固、袁宏、贾逵、郑玄之徒,皆以经史传当世,子何屑屑此事为?’”^{[6](247)}《照世杯·序》:“客有语酌元主人者曰:‘古人立德立言慎矣哉!胡为而不著藏名山、待后世之书,乃为此游戏神通也?’”^[13]这些问答的语气或缓或急,其实质则并无二致。

以上可见文人小说家群体不愿亲附正统士圈子所带来的压力。而糟糕的是,与“士”圈子龃龉的他们,同样不能安心于与“民”为伍。这是由他们对“民”的定性所决定的。在他们眼里,“民”是被动的、待开化的,因此不可能与自己构成双向对等的交流关系。这一点,光从明清拟话本小说相关的文人言说所使用的指称“民”的各种贬词即一目了然。除了“愚民”“愚蒙”“愚夫愚妇”等一般称谓,他们还常常用童稚、妇女一类向来视为社会之最弱势者来代指“民”,“村姑稚童”之于“文人墨士”,成为常见的知识阶层与愚蒙大众的对举方式^⑧。由此,在“士”之外,“民”亦不可能为这些文人小说家所亲附,这一点同样构成其身份认同变化所带来的压力之来源。将上述几方面结合起来看,文人小说家自疏离原来的士圈子之后,又选择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庶民,则他们实际上类似于自我移置于“士—民”社会结构的某种中位地带了。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暂时找不到精神上的亲缘,从而使自己陷入了一种夹处其间的心态困境中。

(二)“夹处”心态与“独醒”修辞

上述心态困境在文人小说家笔下的一种体现,就是普遍出现于不同小说文本中的“独醒”修辞。

“醒”与“梦”是文人小说家描述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时十分常见的一组比喻。如《醒世恒言》《清夜钟》《醉醒石》《醒梦骈言》《娱目醒心编》等,就直接在书名上做了开宗明义的标示。此外,文人小说家在议论相关话题时也常有申说。如西湖渔隐《欢喜冤家·序》云:“(人情)非欢喜不成冤家,非冤家不成欢喜。居今溯昔,大抵皆然……公之世人,唤醒大梦。”^[14]薇园主人同样有类似的表达:“世人梦梦,辄利囚名……宜到一杵清

音，划然俱去，其提醒大矣……名之曰《清夜钟》，著觉人意也。”^[15]两者明确指出文人小说家所批判的对象是“世人”整体，是除“清醒者”之外的全部世界。

事实上，这一批评视野仍是“天下”视野观的延伸。换言之，只有拥有了新的视野后，才能真切地把握世界的总体(包括天下四民)都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之中，而传统视野的知识精英在这一点上被认为是缺乏自觉体认的。同时，“民”又是无能自为的。那么，相对于“士”的视野优势，加上相对于“民”的智识优势，“夹处”境地的文人小说家自然成为唯一意识到世界现实的“清醒者”。这一点，东鲁古狂生在《醉醒石·题辞》中说得更加清楚直白：

古今尽醉也，其谁为独醒者？若也独醒，世孰容之？虽然，亦不可不醒也。不醒，则长夜不旦，世间大事业，安能向醉梦中问之？^{[16](1-2)}

此说法大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果决之志，而“世孰容之”又透露出夹处者上下不得其所的精神困境的现实。题辞者的心态，固然有文人自高的一面，但我们同时不能低估彼所言“世孰容之”的真实程度。从前述文人小说家于社会结构两侧感受到的心灵孤独来看，这一说法算不上夸张之辞。也正因此，“独醒”二字能够唤起同道者更多的共鸣。如《鸳鸯针》作者自号“独醒道人”，《笔瓣豸》亦署名“独醒人编次”等。究其实质，上述流行于文人小说家间的“醒/梦”“独醒”之喻，正是其身份认同的移位导致的“夹处”窘境在修辞上的反映，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心态基础。由此，我们应反思、纠正以往的一种偏见——认为文人小说家的类似表述仅是一些实用的话语策略(如提升通俗小说的文体地位、扩大商业市场等)，是一种缺乏实质感情的夸饰，而忽视了其中所具有的文人特色的心理根源。

三、价值认同：在保守与激进之间

正如前述，文人小说家主动地选择走出士圈子，面向大众，并承担起觉醒“世人”的道义。整个行为过程事实上包含了前后衔接的两部分，前者更多关涉身份认同，后者则牵连“道义”的

内涵以及实施路径，属于价值认同的范畴。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价值立场，在儒家道义的基本框架下，又难免受到时代变迁、身份转换、生存状态等因素的约束，展示出“作为个体，其伦理境遇与应对方式的无可穷尽的差异性”^[17]。那么，以群体的视角考察，文人小说家在身份认同层面所面临的“夹处”窘境，在价值认同的层面是否同样有所体现？又是如何体现的？

(一)“笔墨雅道”与“迂腐道学”

凌濛初自述《拍案惊奇》的宗旨时，说：“是编矢不为风雅罪人。故回中非无语涉风情，然止存其事之有者，蕴藉数语，人自了了。绝不作肉麻秽口，伤风化，损元气。此自笔墨雅道当然，非迂腐道学态也。”^{[18](2)}此处“风雅”的含义，参读《拍案惊奇·序》即可确知：“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褻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18](1)}“得罪名教”即与前所谓“风雅罪人”同，则“矢不为风雅罪人”即维护名教之意。

上述说法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文人小说家的主观认知中当时知识阶层内部存在的价值立场分歧。如果用价值认同的“保守—激进”尺度来衡量的话，以“维护名教”为参照，“迂腐道学”、“俗儒”之流是为完全的保守派^⑨，如《贪欣误》中所谓“世间拘儒每每说起怪幻之事，便掩耳以为不经之谈”^{[19](128)}；而“拈笔”的“一二轻薄恶少”则属专注于“荒诞”和“褻秽”的激进分子，如晚明以来“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的“末流”^[20]人情小说作者恐怕正是凌濛初所批评的对象。相比之下，拟话本文人作者则介于保守和激进之间。他们的基本价值立场，即承认正统的伦理道德为不可或缺，且在当前的社会风气下，更须巩固；而在此前提下，则可以松动局部的价值尺度，以为“语涉风情”“神天鬼怪”等提供叙述空间。因此，《二刻醒世恒言》《八洞天》等都既力求“言之有裨于斯世”，又于取材方面“钦异拔新，洞心骇目”“可资谈麈”^{[21](1-5)}，为所谓“荒诞不经”寻找“当然之理”^{[22](1-2)}。这一点，正是本文要指出的明清拟话本文人小说家在价值认同层面的“夹处”之第一层含义。

值得注意的是,文人小说家虽介于保守和激进之间,但其大体倾向仍较偏于保守一端(具体程度则有个体差异)。“醒世”是拟话本文人小说家的写作底色,这一点决定了他们不会离“正统”太远。凌濛初强调“风情”和“神天鬼怪”在全书中不过是“蕴藉数语”“点缀”,即是这个道理。事实上,从伦理道德的总体立场上看,这些文人小说家与所谓“迂腐道学”“俗儒”其实所同远大于所异。然而,诚如凌濛初所言,他又避“迂腐道学”的头衔唯恐不及。若单从情感的角度看,甚而可以说,被目为“迂腐道学”未必比“风雅罪人”的指责更容易让其接受——否则的话,凌氏实无必要在那段以维护名教为主题的表态最后特地添一句反拨之语。

那么,如何理解文人小说家的这种心理纠葛?从文人小说家言“儒”时的修辞共性或许可窥一斑。如《西湖二集》中常有“迂腐不通之儒”“臭烂腐儒”“眼界不大,胸中不济”等语^{[23](234-238)},可见当时的儒者常因学识不广,以致日常生活中的举动、言谈露出古板的气象而遭到讥毁。而除了这类知识的领域外,在经验的领域,大到政治,小到日常生活的起居、运营等,儒者的窘境亦同。如《豆棚闲话》第九则回末总评将“天下之乱”而“弭盗”不成归于“迂儒懈弛之祸”^{[9](284)}。《拍案惊奇》卷三十五叙秀才卖孩子给财主家却被其算计时,反批评受害者“多是迂儒,不晓得这些圈套”^{[18](547)}。以上可见,“腐”“迂”“拘”一类的鄙辞被普遍使用,构成文人小说家群体言“儒”的一大修辞特色。这些鄙辞无一例外地指向同一个层面,针对的是某一类特别的精神气质。换句话说,他们攻击的要点在“迂腐”“俗”这样死板的气质而不在“道学”“儒”等圣贤书的内容。正是对这种气质的厌弃,导致文人小说家必欲与正统儒者划清界限而后快。

(二) 气质建构与叙述“变调”

诚如上述,“儒”在知识、经验的领域因作风保守而受到批评,加上“儒”在道德领域原本的保守立场,共同构成其“迂腐”气质的来源。而价值立场方面的接近适足以文人小说家招来同样的气质“污名”,这才是后者汲汲于展示

这种排儒姿态的深层心理。同时,说明文人小说家对自我的精神气质的认知和追求,乃有决然相反于此者。

事实上,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这些文人小说家本就是孕育于士传统的反叛者,天然携带反正统的精神因子。虽然由我们的眼光看去,他们在价值认同方面的立场偏于保守,但不论是正统卫道者还是他们自己,都并不这么认可。在他们而言,介于保守和激进之间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激进的姿态。可以说,“叛逆”是文人小说家在精神气质上的自我认知的底色。这一点,从他们对一些类似精神气质的人群的态度即可得到佐证。

一类是风流之士。如《石点头》第五回论“极快活燥脾胃的事”时,声称“有一等人,养得胸中才学饱满,志大言大,虽是名不得成,志不得遂,器器自得,眼底无人,依然是快活行径”^{[24](110-111)}。这里描绘了一类才士的气质、形象,他们自负自足而不待社会之认可。作者在文中将其与正统的孔门弟子颜回、子夏并列,可见推许之心。另如《醒世恒言》卷四十的王勃形象^[25]、《娱目醒心编》卷七的曾英形象^{[26](95-96)}等,这些狂士、豪士,与前述文人小说家相对于正统士圈子的“畸士”“异士”作风,在精神气质上正有相亲之处,故而引类相惜,而非以道德胜。

另一类是士之外的反正统形象。如《鸳鸯针》第二卷为强盗翻案:“这班人,负不可一世之志……宁可拼着一身品节不立,光光明明作个畅汉……却比那暗中算计人东西的,觉得气象还峥嵘些。”^{[27](59)}在特定语境中,“品节”反不如“气象”重要。此外,“品节”更低于侠盗但同样深富个性的偷拐之徒也能得到文人小说家的认可,如《十二楼·归正楼》中的贝去戎、《警寤钟》第二卷的云里手等。甚至对于其中一些完全属于非道德的无赖小人,文人小说家依然流露出某些“赏识”的心理。如《型世言》第二十六回叙光棍借色骗财,有回末评曰:“此等机械,真是颠倒一世。使筹边悟主者而具此作用,又何患主威不霁、边患不宁耶!”^{[5](237)}言下之意,所谓“筹边悟主者”即犯了“迂儒”不能“弭盗”之“迂”的问题。究其实质,文人小说家之所以称颂这类

群体胜过称颂正统儒者，从心态根源来看，正是因为其精神气质与文人小说家的自我认知或理想有一脉相通之处，而通过这种叙述操作和对比，文人小说家亦得以间接在小说中向读者建构起符合衷曲的自身气质形象。

由此可见，文人小说家在价值认同层面所面临的“夹处”困境，一方面是价值立场的介于激进和保守之间，另一方面则是相对保守的价值取向和相对激进的气质取向之间的龃龉。后者更隐蔽，却可以更普遍地解释文人拟话本小说中许多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矛盾的叙述现象。除了上述对非正统人群的态度，小说中常见的涉褻描写也可以从文人小说家这方面的心态来把握。如《石点头》第五回“莽书生强图鸳侣”，主题如开篇诗所云“从来色胆如天大，留得风流作骂名”^{[24](110)}，整体的叙述风格亦较为严肃。小说结尾还安排男主角人莫莫谁何受到病痛的惩罚而死的情节，并用前世果报解释了男女主人公这段私奔的艳史，这都可见作者不愿轻启效仿之端。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较统一的劝惩氛围下，作者又饶有兴致地插入“一首七言绝句”咏丫头在野外小解。《醒梦骈言》同样是说教氛围浓厚，如第十回对《聊斋志异·小二》的改编，使女主人公的形象更加板正、道学，却又自我破坏式地插入“红衣大炮”这样的夫妻褻谈文字^[28]。类此还有《八洞天》卷四等处的情色韵语^{[22](73-74)}，不一而足。

以上这些存在于严肃说教中的“变调”现象，论其缘故，或出于吸引读者的需要(前提是无伤主旨之大雅)，或体现作者自身的趣味，或纯粹用来向旁人展示一种“非迂腐道学”的姿态。但不论取何种解释，事实上都绕不开文人小说家在价值立场和精神气质两方面之间的尺度游移。这使得他们的叙述常常呈现出立足点的不确定性：一面维护，一面出格。至于在这些“出格”的地方，有多少非关于价值立场，而仅仅是为了展示、维护自身的精神气质免被“污名化”而被迫采取的一种姿态、一种修辞策略呢？这种日常而隐微的心态因素在我们分析小说文本相关的矛盾叙述现象时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其背后，则反映的是文人小说家群体在精神气质上的自我认知和追求，以及他们对此的高度敏感心理。

四、日常体验：在现实与理想之间

由于视野的变化，“日常的生活”成为不亚于宏大政治、军事题材的一个对象，而更完整、细致地进入明清拟话本文人作者的视线内，并在从事叙事体写作时无时无刻不在描述、评价和反思。由此，文人小说家得以在对日常生活的全面体察中，更具体、真切地体验“现实/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包括外部环境的顺逆与内在心气的消长、物质条件与伦理道德实践的相关性、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感等。这一点同样促成并加深了他们的“夹处”心态。

(一) 心气

“心气”作为一种心理衡量指标，指向的是个体在外部因素变动下主观努力的积极性和有效性。我们对明清文人拟话本的表面印象、整体观感，往往是以形而上的道德叙事捆绑人物的言行。事实上，当文人小说家将笔下的对象转向具体的日常生活时，他们其实非常擅长于在局部场合研诂日用人情的隐微情绪、心境。如《型世言》第十八回详细分析了贫士所处的精神状态：

贫贱的人，衣食经心，亲朋反面，意气易灰，便把一个人折挫坏了……独有夫妻，是最可提醒、激发的……絮聒柴米，打骂儿女，寻死觅活，不恤体面，叫那丈夫如何堪得？怕不颓了志气？……故此人得贤妻，都喜得内助，正喜有提醒、激发处，能令丈夫的不为安逸、困苦中丧了气局，不得做功名中人。^{[5](159)}

这段话反复提到“意气”“志气”“气局”一类概念。以往我们多注意到的是这些小说通常将读书人的失意与命、道德一类的命题关联在一起。这固然是劝惩主题下一种常见的叙述逻辑，但我们往往忽视了小说家也在努力为另一种解释发声，与命、道德一类解释话语相形之下十分平凡的一套逻辑：在日常生活中“颓了志气”的读书人又如何能够扬名天下？所谓“不得做功名中人”，其实无异于诗文传统的“士不遇”情结。但相比之下，在文人小说家的叙述中，这种情结远离宏大叙事，而更多意味着日常生活的切肤之痛。正是对后者的聚焦，使得属于绝大多数读书

人在日常朝夕之间的真实精神世界得以揭示。

《清夜钟》第五回“小孝廉再登第大砚生终报恩”将主人公小孝廉设定为一个德才俱佳的人物，而同样从“心气”的角度描摹其科举命运的起伏。整篇小说，一方面将才、德一类条件从功名失利的因素中排除，一方面在“志气之低昂”与“功名之有无”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日常生活的视角下文人小说家的现实关怀所在。正如小说家所言：“凡人志气一颓，便多扼塞；志气一鼓，便易发扬。”^{[5](167)}

《醉醒石》第十四回写秀才遇妻子闹穷时也评说：“人的意气鼓舞则旺，他遭家里这样摧挫，不惟教书无心，应考也懒散，馆也不成个馆，考事都不兴。”^{[16](124)}而《警世通言》卷十七则就此给出了一条具体的生活指导：“列位看官们，内中倘有胯下忍辱的韩信，妻不下机的苏秦，听在下说这段评话，各人回去硬挺着头颈过日，以待时来，不要先坠了志气。”^{[8](240-241)}然而，与小说人物起伏的人生轨迹相比，始终陷在日常生活泥淖中不得一振奋的机会，这种情形恐怕更接近于现实中一般读书人的生活状态。因而在抗拒各种困难中保持心气，势必成为一项更为艰苦的斗争。文人小说家正是在生活观察甚至个人体验中对此心有戚戚焉，故而在笔下的叙事、议论、抒情中反复聚焦这一命题。

(二) 伦理和道德实践

伦理、道德的实践是日常生活的应有之义，但衣食之累导致伦理、道德实践的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强调伦理、道德的优先来解决。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纠结同样是文人小说家着力刻画的日常困境之一，因而像《生绡剪》第十二回中“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小开门用着他。世间劳碌无休歇，谁能七件免波查”^{[7](245)}的慨叹所在多有。而这更是生活于“宋、元、明以来”“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29]的社会大环境中的读书人所不可避免的。

文人小说家清醒地意识到上述矛盾是当时一般人生活的基调，因此即使在一些充满理想意味的情节设置中，仍难掩他们在这方面的真实担忧。如《二刻醒世恒言》上函第四回“世德堂连双并秀”旨在宣扬兄友弟恭，不脱厚德之报的格

套，然其开头部分却真实刻画了兄弟合居时，妯娌间“只因家计萧条，就无了仁义”“情分，情分，只是叫人饥寒难忍”^{[21](24-25)}的反目场景。《生绡剪》第十一回叙写读书人弃儒经商的成功故事，而起点则是沉浸在书史的精神世界里的读书人被指责对父亲赡养不周后的自我忏悔。由此亦可推知“异日功名”与“眼前衣食”^{[7](224)}的矛盾对读书人现实中的日常心情会产生如何的磋磨。

而在兄弟、父子之外，冲突最激烈因而受注目最多的伦理领域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夫妻关系。《连城璧外编》卷三叹道：“欲作寡索人，无奈妻孥交谪。叹息，叹息，没个点金神术。”^{[6](425)}而文人小说家视野的包容在于，“妻孥”发出的声音并没有一味被处理为不合理的：“古语云：‘酒食朋友，柴米夫妻。’做丈夫的人，不能勾封妻荫子，也就于夫纲有愧了；连‘柴米’二字尚不周全，使妻妾子女熬饥受冻，这等的丈夫，怎怪得妻子埋怨？”^{[6](425)}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她们的心理活动在文人小说家的笔下也充满多义，而非一味任劳任怨的沉默形象。《二刻醒世恒言》下函第四回“穷教读一念赠多金”、《鸳鸯针》第一卷“打关节生死结冤家”等都着意写贤妻对生活如何继续的殷勤担忧和不怨之怨，这对丈夫构成了另一种“妻孥”声音的刺激。对此，《警寤钟》第四卷“海烈妇米杼流芳”特笔描绘穷秀才面对日复一日操劳家务的妻子，反而难以承受这种高尚者的压力：

我自恨读了这几句穿不得、吃不得烂穷书，致你(昼)不停针、夜不住剪，劳劳碌碌耽饥受寒，是人吃不得的苦，俱是你受尽，反叫我安居肆业，真是我为男子的，万不如你。我何忍累你如此受苦，我寸心碎裂。你从今不要眠迟起早，万一该绝我，宁可大家俱死，何苦教你一人受罪。^[30]

这些话完全脱离了纯粹道德的一套，呈现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丰富的情感世界。这些由文人主笔的通俗小说时常在细节、局部处给人道德上松绑的观感(即使是间歇性的)，一定程度上正是建立在这种体认并承认日常生活情感的基础上。耐人寻味的是，文人小说家的这些额外思虑，反而削弱了抽象的伦理道德直截了当地指导个体生活的力量，致使其心态更深地陷于纠缠摇摆

之中了。

(三) 日常的时间感

上述现实生活中的心气之争和伦理、道德实践困境绵密地贯穿于日常朝夕之间，由此，文人小说家们普遍产生了对“日常的时间”的敏感以及相似的一类感受。如“世间劳碌无休歇”“终日营营觅觅”^{[31](54)}一类反复出现的咏叹，指向了“日常的时间”整体上的一种永恒的漫长感。这种时间感的根源，即如《西湖二集》第三卷中所言：“(穷秀才)终日要料理家事，愁柴愁米，凡是米盐琐碎之事，一一都要经心，便费了一半读书工夫，这也便是苦事了。”^{[23](27-28)}因为把“读书”与“家事”对立起来，前者是心之所向，是乐，后者是身之所迫，是苦，故而在时间的主观感知上就变成了“终日”都在米盐琐碎之中了。《鸳鸯针》第二卷写贫儒时大来丢馆之后，“坐在家里忧闷，对着那黄面婆子，就似有仇隙的一般，终日攒着两眉，也就亏他捱过了两三个月”^{[27](63)}，也体现了作者对日常时间的漫长感的感同身受。

这种漫长感的夸大，适足以反映一种对“日常的时间”的成见：单调、重复、缺乏价值。其中充斥着他者的“絮语添愁”“平日闹吵”，而自我的生活则变成了“苦捱朝暮”。^{[16](93)}关键在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他者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被文人小说家视为合理的存在，才反过来具有左右“自我”精神世界的力量。因此，《醉醒石》第十一回中，魏进士登第前面对妻子的怨恨时，儒家刑于传统的思想武器(训妻勤俭、安贫等)反而鲜见用场，而代以功利意味的“勉强支对”：“不要怨，倘得中了，包你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十倍还你妆奁，也不打紧。”^{[16](93)}这无疑更加剧了“日常的时间”的负面意义。

而对一般读书人而言，在前置的科举目标下，“日常的时间”还在另一个层面被不断地表述：时间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二刻醒世恒言》中张素卿妻的半夜辗转之思“如今年近岁逼，如何区处？明年又不知怎生过日”^{[21](125-126)}，指向一个没有尽头的日常时间之流。《鸳鸯针》中王氏所言“只不知命运何如”亦是此意，而“又无生殖，田产卖得罄尽”使整个家庭的运转随时可能面临崩溃^{[27](6)}。就一般读书人的真实心境而

言，科举之路，正所谓“迟早成败，都由不得自己”^{[16](94)}，而难免发出不时之叹：“使吾辈得展一官，效一职，不出其生平筹划以匡济时艰，亦何贵乎经笥之腹、武库之胸耶！”^[32]这种化入生活每时每刻中的焦虑、不安，势必继续放大日常生活中的时间的漫长感，而加剧对时间这一因素的敏感，从而令夹处于“现实/理想”之间的心态不断延宕。

五、否定、主观与夸张：一种普遍的写作风格

以上分别讨论了明清拟话本文人小说家所面临的三重“夹处”的心态困境，包括：夹处“士—民”之间的身份认同；面向“民”时引发的价值立场内部，以及价值取向与精神气质取向之间的夹处；反思“士”的日常生活时，则强化了现实与理想二者之间的夹处。三者的叠加，构成了文人小说家自我认知的图景：在现有的诸秩序和话语中无法明确界定自己，导致不断的游移和自我解释。前文所引凌濛初关于《拍案惊奇》题旨的措辞，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矢不为……非无……绝不……非……”云云)。在现有的诸秩序和话语中无法明确界定自己，在修辞领域即意味着暂时缺乏正面定义、定位自己的语言。于是，想要完成自我解释，就不得不迂回地采用否定形式的修辞策略：既不属于一方，又不属于另一方。这种修辞策略的连续运用，就产生了上述修辞现象：在寥寥数语中频频出现“不”“非”一类否定性质的字眼。

这种否定修辞，通过“去其两端而叩其中”的方法来表明自己所处的区间，虽无法做到精确表达，却是现有的话语运用下，对充满复杂面向的“夹处者”而言最富实用和成效的一种，故而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文人小说家对各类话题的议论中。如《十二笑》卷四论“情之所钟，正在吾辈”，一方面将好色之徒排除在“吾辈”之外，另一方面又加意区别了更容易互相混淆的“情痴”与“情钟”，从中方才见出作者对“情”的主张区间，由此确立了对主人公蒙丹秋的批评基调^{[19](64-65)}。《云仙笑》卷五论“钱财粪土”，既不

以钱财为可轻,又不以钱财为可吝^{[31](74-75)}。《五色石》卷八一边抨击奴婢负主的世风,一边列举主负奴婢的事例,道“为此奴婢辈纵有好心,一齐都灰冷了”^[33],可见对现实的考量促成了小说家的折中立场。李渔则在《无声戏》第十回“移妻换妾鬼神奇”中就“女子吃醋”话题发表了他一向的“诡辩”风格的议论。这一风格从修辞的角度看亦是肯定修辞的一种运用。如他先反驳了通行的“醋”为劣德的观点,在此新解的基础上,又要防止流于另一端,“这东西,原是拿来和作料的”,“若用多了”,“不但无益,而反有损”^{[6](190-191)}。李渔的诸多议论,典型地反映出“夹处者”的思维方式和修辞策略。

如上所述,在不同的语境中普遍运用的否定修辞,是文人小说家“夹处”心态和思维的外化,这一情形因拟话本小说文体而得到更全面的呈现,也因这类文体而被放大。其缘由在于,叙事体写作天然要求对生活中各类群体的人物进行描述,这种情况下,势必随时陷于揣摩、评述他人的境地,而不得不与自身的价值判断相互往还。同时,文人拟话本广泛涉及的伦理、知识和信仰等精神方面的话题,也需要时时反求诸己,以自有的价值标准衡量之。这些写作中的环节,无疑给他们提供了许多自我认知的机会。但如果始终无法形成正面的、确定的自我定义,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进入视野的诸价值对象(包括精神、文化与社会身份领域的人群及相关话题),被尚处游移的标准衡量时,都将或多或少地引起不满,进而反映在文本层面,即生成其特色的语体风格。普遍的否定修辞(包括反问的形式)就是其中之一。而这种参照已有秩序和话语来界定自己的方法,其逻辑的客观结果是,文人小说家把自己排除在一众现存秩序和话语之外了,并由此形成一种超级主体意识以及相关的修辞风格——强烈的主观情绪、夸张的概括和描述等,其具体的表现为无差别的指称词、极端的程度副词、骂詈语之类。

第一,无差别的指称词。如“世人”一语,在文人小说家的语境中,“世人”往往意味着一个贬义的整体,与言说着的“我”构成无处不在的对立。如《贪欣误》第三回云“我笑世人碌碌

庸庸”^{[19](143)},第四回又云“我劝世人”^{[19](168)}等等,这类“笑”和“劝”的表述在文人拟话本小说中比比皆是,无须赘举。这也是我们对这些小说批判世情、劝惩读者的基本认知所由。而我们在这里所要关注的,则是这类表述的修辞形式。一是“世人”被消除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差异,成为以偏概全的“借代”修辞,二是“我”以超越的地位进行居高临下的批判和教导。二者结合,形成无人、无处、无时不被笼罩着的言谈氛围。因此,即使不论其言说的内容,此一修辞形式本身便已构成小说说教意图的增强了。

第二,极端的程度副词。如“最”这样代表最高程度的语辞标记,在文人小说家的议论中高频出现。以凌濛初的表达习惯为例,其《拍案惊奇》卷十一劝诫“人生最不可使性”^{[18](155)};卷三十二又说“人生世上,‘色’字最为要紧”^{[18](487)};《二刻拍案惊奇》卷八又说“人世上……惟有赌博一途最是为害不浅”^[34];等等。酒、色、财、气四者,常为时人所诟病,故在上引诸材料中,作者处处以最激烈的口吻出之。在此,我们并非要探究同一作者心中酒、色、财、气究竟何者才是人生之最不该,或者批评他这些形式上自相矛盾的议论,而是试图说明这是一种有迹可循的修辞习惯,即在每个具体的话题情境中,都以一种专断的叙述者形象呈现高度相似的语言风格。类似“自相矛盾”的专断形象,又如《型世言》第二十三回“如今人最易动心的无如财”^{[5](202)},第二十六回又说“见得人到女色上最易动心”^{[5](227)};《娱目醒心编》卷十二有“冥中最重誓言”语^{[26](195)},卷十六又有“冥中淫律最重”语^{[26](238)}等。可见此主观色彩的修辞风格非仅一时代特殊之风气所染,而为明清文人小说家群体共同的修辞特征,背后则是一种共同的精神处境与思维习惯的反映。像“最”这样的极端程度副词的用例,在其他小说文本中唾手可得、蔚为大观,而性质相通者,另外还有“从来”“自来”“大凡”等一类夸张的概括和描述,在具体情境中的表现亦如上,不再赘言。

第三,主观、夸张的风格有时候则入于骂詈一流。以“粪蛆”一类的污语为例。从《西湖二集》《生绡剪》《通天乐》等的描述中可知,“粪

蛆”在当时的知识世界普遍被视为轮回中之最下等，因而含有宗教层面的诅咒含义^[35]。从这一语辞背景出发，在《石点头》第八回、《豆棚闲话》第五则、《二刻醒世恒言》下函第九回等不同小说文本中亦反复出现的此类污语，实际上反映了文人小说家群体共同的骂詈冲动。文人有嘲世、骂世的大传统。如果结合个人遭际，十分容易为相关修辞风格找到合理的解释。不过，我们在这里更愿意强调一种超出个人遭际的普泛写作背景。也就是说，骂詈作为文人小说家的超级主体意识下主观色彩强烈的写作风格的一种表现，其直接肇因是小说家对现行诸秩序和话语的自我排除，而根源于该群体自我移置的“夹处”处境及衍生的思维方式。

否定修辞与主观、夸张的修辞风格，二者在逻辑上正是一体两面：通过对现有的诸秩序和话语的不断否定来界定自己的区间，此一行动本身就隐含着—个强大的“自我”。换言之，文人拟话本小说浓厚的劝世、说教感，其精神源头则与文人小说家强大的“自我”息息相关。这些修辞的行为，归根结底成文人小说家精神世界的“自我大写”。不过，劝世的意图表面下所赖以支撑的“自我”是否真如看起来的这样强大？还是说，实际上是由于缺少赖以自立的明确定义和定位，反而造成面对任何价值对象都器器“自大”的心态？事实恐怕更倾向于后者。而结合上述文人小说家涉及自我认知和自我表述时的诸种表现，还可以说，这种“自大”的心态因缺乏坚实的心理和现实基础，最终无法掩盖他们精神世界实际所处的焦虑。

六、结语

明清拟话本小说的文人作者，在主流舆论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成为知识阶层介入大众文化生产的代表力量之一，这注定将是一场充满心理拉锯的跨界之旅。本文使用“夹处”这一概念描述这一文人小说家群体的一般心态特征，借以道出其所身处的一种中间状态，其语义还指向他们从多方面同时感受到的压力，以及这些压力的持续存在和空间逼仄所导致的整

体精神状态的高度紧张，而这种心态又与特定小说风格的生成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得以从新的角度来理解通俗小说编创主体变迁的小说史意义，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明清拟话本小说形态的发展进程与演变逻辑。值得一提的是，在拟话本之外，参与其他通俗小说编创的明清文人身上，亦同样存在类似的“夹处”困境。如刘雪莲《天花藏主人创作思想矛盾新探》即指出天花藏主人身上存在的“维护正统‘名教’的思想与大胆的婚姻观念相矛盾；‘缘出于天’的思想与才子佳人主动寻求婚姻的行为相矛盾；才子科甲高中的同时又被举荐与帝王的理想，与自身现实的贫困、落魄、无人举荐相矛盾”等情形^[36]。那么，本文所探讨的文人小说家的心态共性是否可以放置在更大的通俗小说史和士人精神史视野下进行观照？“通俗”对于明清知识群体的精神变迁还有哪些可供抉发的面向？个中不尽之义，仍待进一步的追索。

注释：

- ① 相关论述，参看：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8—22页；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37—590页；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266页。
- ② 刘勇强《文人精神的世俗载体——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新发展》（《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明清小说家的寒儒本色与才子心态》（《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名家演讲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较早运用群体视角讨论相关话题，一些观点对本文启发良多，如“这些小说家本身也是边缘人物，他们未能跻身上层，又不甘于下层，游移两途却不能左右逢源”；“小说家在社会结构中实际上处于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由于寒儒本色与才子心态的混合，他们对上对下都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作为思想的出发点，这显然对创作会有所制约”；等等。与之不同的是，本文单纯从“文人编创通俗小说”作为兼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精神活动（文化行为）这一点出发，而并不预设文人小说家的社会身份、经济条件、政治地位等（因为文人小说家是否都是“寒儒”身份，事实上并无法确证）。而单就群体视角本身而言，此后亦较少从类似思路着手分析者。
- ③ 各举一例以稍窥之，如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

消极行为——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探讨明代最后二十年在知识阶层中兴起的批判“文人阶层的生活方式”的“修正派”力量,这一批判运动在改朝换代的催动下进一步壮大,重塑了有别于晚明风习的清代文化的基本面貌;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则强调了“商业发展本身的吸引力”带来的商人伦理道德和儒家原旨的观念、价值的同步调整;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三编第一、二节集中考察了明清之际西洋天学的输入对知识群体在自然和社会结构的传统认知方面的刺激。

- ④ 绿天馆主人正是在“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的政治背景下讨论当代通俗小说。
- ⑤ 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称唐人小说等“其文雅驯,闾阎罕能道之”,而小说的宗旨当“归于厚俗”,达到“闾阎之务”“通于廊庙”的效果。袁载锡《雨花香·序》结合自己“江都县儒学教谕”的教官身份,特地强调“庠序多士,固已蒸蒸向道矣。至于市井乡野略读书与不读书之人,余不能一一萃而教之也”,进而把石天基“晓示愚蒙”“开导常俗”的《雨花香》视为名教的另一支柱。
- ⑥ 对此,冯保善《明清江南科举壅滞与通俗小说创作》(《江海学刊》2016年第4期)、《明清江南教育大众化与通俗小说读者市场》(《文艺研究》2018年第6期)关于江南地区通俗小说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观点可资参考,如明清江南“在辉煌璀璨的科举成就背后,掩盖着因为高密度人口、发达的科举教育和录取名额限制所造成的大量读书人沉沦社会底层的事实;谋生艰难,又生活在商业出版繁荣地区,使得这批文人很自然地或者成为书商,或为书坊主雇佣,替他们做编辑写手,相较其他区域,江南的通俗小说创作,也因此有了更加充分的人才储备,这也是江南成为通俗小说创作、出版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 ⑦ 《古今小说·叙》“史统散而小说兴”、《警世通言·叙》“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欢喜冤家·叙》“圣人不除郑卫之风,太史亦采谣咏之奏”,以及湖海士《西湖二集·序》称作者“以小说见,其亦嗣宗之恸、子昂之琴、唐山人之诗瓢”等,皆属此类言说。
- ⑧ 如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伪斋主人《无声戏·序》“童稚妇女”等一类修辞。
- ⑨ 如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序》称其书“即间及神天鬼怪,故如史迁纪事,摹写逼真,而龙之踞腹,蛇之当道,鬼神之理,远而非无,不妨点缀域外之观,以破俗儒之隅见”。

参考文献:

- [1] 冯保善. 冯梦龙史实三考[J].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1(6): 1-7, 124.
- [2] 徐永斌. 凌濛初的南京冶游历程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 27-36.
- [3] 吴承学, 沙红兵. 身份的焦虑——中国古代对于“文人”的认同与期待[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 25-39.
- [4] 冯梦龙. 三言喻世明言[M]. 陈熙中,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5] 陆人龙. 型世言[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
- [6] 李渔. 无声戏 连城璧[C]//李渔全集: 第八卷.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 [7] 谷口生, 等. 生绡剪[M]. 李落, 苗壮, 等校点.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
- [8] 冯梦龙. 三言警世通言[M]. 吴书荫,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9] 艾衲居士. 豆棚闲话[C]//古本小说集成(第三辑): 第11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10] 冯梦龙. 冯梦龙集笺注[M]. 高洪钧, 笺注.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11.
- [11] 谈迁. 北游录[M]. 汪北平,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65.
- [12] 梦觉道人, 西湖浪子. 三刻拍案惊奇[C]//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 第39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4-8.
- [13] 酌元亭主人. 照世杯[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6: 105.
- [14] 西湖渔隐主人. 欢喜冤家[M]. 周有德, 等校点.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9: 1-2.
- [15] 薇园主人. 清夜钟[C]//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 第13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1-7.
- [16] 东鲁古狂生. 醉醒石[C]//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 第41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17] 赵园. 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218-219.
- [18] 凌濛初. 初刻拍案惊奇[M]. 张明高,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19] 墨憨斋主人, 等. 十二笑 贪欣误 天凑巧[M]. 曹亦冰, 等点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 [20]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188.
- [21] 心远主人. 二刻醒世恒言[C]//古本小说集成(第二辑): 第7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22] 五色石主人. 八洞天[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 1985.
- [23] 周清原. 西湖二集[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7.
- [24] 天然痴叟. 石点头[M]. 瘦吟山石, 校点.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8.
- [25] 冯梦龙. 三言醒世恒言[M]. 张明高,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827-828.
- [26] 草亭老人. 娱目醒心编[M]. 汪原放,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27] 华阳散人. 鸳鸯针[M]. 李昭恂, 校点.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5.
- [28] 守朴翁. 醒梦骈言[C]//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 第 56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434.
- [29] 沈垚. 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C]//中国历代商业文选[M].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2: 427.
- [30] 嗤嗤道人. 警寤钟[C]//古本小说丛刊(第二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485-1486.
- [31] 天花主人. 云仙笑[M]. 朱眉叔, 校点.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3.
- [32] 郑龙采. 别驾初成公墓志铭[C]//凌濛初考论[M]. 赵红娟, 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1: 54.
- [33] 笔炼阁主人. 五色石[M]. 萧欣桥, 校点.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5: 186.
- [34] 凌濛初. 二刻拍案惊奇[M]. 吴书荫,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144.
- [35] 石成金. 雨花香 通天乐[C]//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 第 52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109-118.
- [36] 刘雪莲. 天花藏主人创作思想矛盾新探[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6): 199-203.

The "sandwiched" mentality and its influence of the literati authors of vernacular stor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U Feipe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to the Mid-Qing Dynasty, vernacular stories written by literati writers were popular for a time, and a large number of such authors emerged. Inspecting these literat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we can find that they are faced with the "sandwiched" mentality in the aspects of identity, value identity and daily life experience. This dilemma leads to the wandering of self-cognition and continuous self-explanation, which gives birth to a generally negative, subjective and exaggerated writing style that reflects the anxiety of the literati's spiritual world. The relevant discrimination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iterati authors in promoting the vernacular stor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 vernacular stor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erspective of "group"; literati author; "sandwiched" mentality; writing style

[编辑: 陈一奔]